

中国心理偏失 :圆满崇拜

程瑶麻摇摇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本书从叙事性文学（小说、戏剧）的实际出发，对中国文学中普遍存在，至今影响深广的“大团圆模式”（或称“情结”）作出批评性的概括，并对之进行学理性分析。作者的眼光、思路和批评的锋芒，不限于文学，不限于艺术欣赏，而企图深入到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传统之中，挖掘“大团圆情结”的深层基础，从而对中国人的这个“心理痼疾”，作出病理分析。作者渴望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趋于健康的心情很迫切，很真诚，这是十分可贵的。

——董乃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所论“大团圆情结”是关系到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审美意识、审美标准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对此虽然有所讨论，但以专著形式细致而深入探讨者，其实并不多见，因此应该说本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周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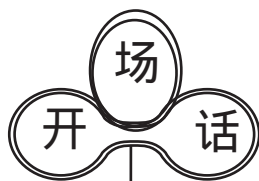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目摇摇录

开场话摇千年之交说“圆满”	员
绪摇论摇“大团圆”批判与“国民性”改造	员
摇一摇“大团圆”心理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员
摇二摇道德和心理	苑
摇三摇“大团圆”心理的系统性	苑
上摇编摇中国叙事文学的圆满情趣	猿
摇一摇“大团圆”心理模式探源	猿
摇（一）“早熟”的中国历史意识	猿
摇（二）“晚熟”的文学叙事观念	苑
摇（三）何谓“大团圆”？	苑
摇二摇中国文学“大团圆”模式演变轨迹（上）	苑
摇（一）从“怪”到“奇”	苑
摇（二）唐人“作意好奇”	苑
摇（三）“大团圆”情趣在宋代的普及	苑
摇三摇中国文学“大团圆”模式演变轨迹（下）	苑
摇（一）元杂剧“解颐”说	苑
摇（二）明代短、长篇小说的“圆满”套路	苑
摇（三）清代对“大团圆”的反拨	苑
摇四摇革命文艺创作中的非“圆满”观念	苑

摇（一）革命文学会重蹈“大团圆”覆辙么？	怨
摇（二）新时期非“圆满”观念与作品示例	怨
摇（三）戏剧影视创作中的情节意识	源
摇五摇公案、侦探与推理小说散谈	源
摇（一）世事之恶与道德之美	源
摇（二）事理之趣和侦探小说	源
摇（三）东方推理小说的前景	愿
摇六摇“大团圆”非悲、喜剧论	愿
摇（一）参照系与开锁钥	愿
摇（二）“大团圆”与悲、喜剧观念比较	愿
摇（三）“大团圆”模式的出路	愿
摇七摇论文学情节的可驾驭性	怨
摇（一）故事架构的可能性	怨
摇（二）人物行动的可行性	缘
摇（三）“大团圆”结尾的可信性	愿
中摇编摇中国社会心理的终极情结	愿
摇一摇“大同”理想得失谈	愿
摇（一）审美情趣和社会情结	愿
摇（二）“大同世界”与“乌托邦”	源
摇（三）理想境界和理性审视	源
摇二摇“胜者王侯败者贼”析	苑
摇（一）源远流长的“成败论”	苑
摇（二）“正统论”与史官文化	愿
摇（三）轻言重行的政治传统	怨
摇三摇“盖棺”实难“定论”	缘
摇（一）“盖棺定论”的人生目的	缘
摇（二）“盖棺定论”难以尽信	愿

摇（三）生命重在内容与过程	圆范
摇四摇中国人的急切实用心理剖析	圆猿
摇（一）行为目的：“有用”	圆猿
摇（二）急切实用：“一步到位”	圆怨
摇（三）生活理想：“诸事圆满”	圆原
下摇编摇中国哲学观念的目的意识	圆园
摇一摇论中国目的意识之短长	圆园
摇（一）目的意识的萌生及成熟	圆园
摇（二）过程观念与结果意识的失衡	圆远
摇（三）中国目的意识偏失及其校正	圆圆
摇二摇禅宗一解	圆缘
摇（一）禅宗研究的心理学视角	圆缘
摇（二）“顿悟”与中国传统目的意识	圆缘
摇（三）禅宗教义精芜辨	圆圆
摇三摇重提“问题与主义”之争	圆怨
摇（一）未必“适时”的胡适之论	圆怨
摇（二）“根本解决”之得失	圆源
摇（三）理想动力与可行途径	圆圆
编摇外摇中日文化心理杂谈	圆缘
摇一摇理解人心非易事	圆缘
摇二摇大小之辨	圆猿
摇三摇好坏之分	猿圆
摇四摇内外之别	猿范
后摇记摇再说改造“国民性”	猿猿



千年之交说“圆满”

进入 2000 年，即是十九和二十这两个世纪之间的交替，称得上是人类开始纪元后走完第二个千年的历程，开始迈进新的下一个千年的起点。就此来说，普天下人多么关注和看重这个斗转星移中的“一刻”，也不能算是过分。“跨世纪”，也许会近些年来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在这里想提及的话题是，在这难得一遇的千年之交的关口，人们心里都能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或期待呢？显而易见，世界上东西南北，各色人等对此的回答，称得上是“五味俱全”的。譬如，或远听，或遥看那些物质与财富多得无法再多的发达国度，虽说那里时不时地会有些危言耸听的所谓“世纪末”的告诫；还有的人，竟追随什么“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之类“先知”，要“以身作则”地将人类引向“天堂福地”，以至闹得对此不太心甘情愿的人们很有点诚惶诚恐。不过，据美国的一个名叫罗帕·斯泰奇的世界调查网，在 1999 年至 2000 年间搞的“世界公民文化消费潮流调查”，眼下大多数西方人，对自己的境遇还是觉得差强人意的。人家那里的事，个中详情咱搞不太透彻，且不

去说它。令人最感兴趣的是，那里边还有中国人在这近“世纪之交”的心理测试。据他们的统计，中国人目前觉得“幸运”的很少，可感到“悲哀”或“冲某人喊叫”发脾气的也不能算太多。认为心情“愉快”的人数比率比上不足，但也说得过去。总之，心境状态大体良好。这个西方调查网也承认，中国人目前的这种满足感，并不是出自逆来顺受。因为就对社会前景的关切程度来说，现在中国人是高于全球公众的平均值的。其中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基于理性的关切和选择，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总体走向是可接受的。

眼下中国社会心理的这种现状，显然是与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诸方面改革的进展有全面的联系。目前中国人的心理满足感，同三十多年前的“大跃进”前后，以及二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曾有的那种普遍心理狂热和精神亢奋状态，以及不久便随之而来的强烈幻灭感相比，差别已相当大了。年岁大些，有点这类记忆的人，认真对照一下，便不难觉察出，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期待与满意程度，已有了多么显著的变化。我甚至由此联想到其中隐含着的这样一个心理悖论：要是中国人后来没有吸取诸多的教训，仍像以前那样，信奉并且企盼着睡上个觉，睁开眼就能过上“饭后吃一个苹果”，或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式的“共产主义生活”，那也许至今大多数仍旧不会知道苹果和电话为何物的。而这些年来，当不少中国人当真一步步地脚踏实地种出了“苹果”，家里也安上了“电话”之后，即使不再故意将神往诱人的“理想”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人们也比较心满意足了。由此不难看出，在付出过巨大的精神和物质代价之后，中国的现实生活毕竟有了些改变，它也真正能够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习惯。于是，这就又触及到了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思想界里屡屡提到的一个话题：

“改造国民性”，即如何改变中国人旧有的心理惰性和精神素质的问题。在这个既是世纪，又是千年之交的前后，借鉴以前的历史和事实的启示，现在的中国人真到了该从根本上改变那已久成“病态”的心理，就是不问必须的过程与手段，一心神往最后“圆满”和“大团圆”的情结的时候了。

快到了 1911 年，再一次提起改造“大团圆”的心理病态这种话题，让人觉得好像中国人有些长在“春眠不觉晓”中，精神劣质实难根除似的。确实，早在纪元起始前后，《庄子》一书里就提到，有位名叫温雪子的人，说过时当天下大势流变，“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很不以只讲究君臣和上下规范、道貌伟岸的孔老夫子为然。他提示儒家，也应该正视意愿、追求和理想之类的“人心”。借孔子之口，他道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醒世恒言”。（《庄子·外篇·田子方》）实际上，儒家也并非是掩耳盗铃，真正无视“人生而有欲”的。大约是觉得那时正当天下大乱，世事未定，他们便强调社会秩序“唯此为大”，不偏不倚地说人要“发乎性情，止于礼义”。当时老孔夫子还未失其厚道之意，可能同时也是担心人心会因受拘于道德仪礼而心灰意冷，就没忘在《论语》的“另册”即《礼记》中，替那时人描画出了一幅“大道之行”的最高境界，即终将实现的美好蓝图——大同世界。这《礼记》是否为孔家真传，后来代有争议。但是，说“大同”乃儒家向当时人悬起的最终社会理想，那是不会大错的。

儒家宗旨是为了稳定世态格局，因此主要担心的，还是人欲之恶的一面，即“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①于是，纂写《论语》

① 《礼记·礼论》。

识其成熟的迹象，踟蹰来迟。大约是借助于道教的太上感应，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因果轮回之类观念，使得这段历史中的中国人，仍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在这个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儒教道德网络相对脆弱的时期，人们心里的欲念、幻想、追求等等意识，其发育已显示出些病态来了。其结果，便是在第一个千年前后的宋代，形成了充斥史书中的“成者公侯败者贼”的王朝更替观念，还有不落言筌、直指本心之类的中国禅宗精义，以及最为典型的传奇、话本、杂剧等叙事文学中的“大团圆”情节公式，等等。这涉及到不同文化侧面的种种形态，其实无不表征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心理特征，那就是：由于忽略具体的、细致的步骤或者手段，人们心目中向往的那些美好的结果和理想的目的，大都是“合情”却未必“合理”，甚至还自欺欺人地纵情神往一种没有什么过程与依据的“圆满”。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的思维和心理相对“早熟”的一个典型标志的。

“早熟”是一种发育不全的成熟。中国人对“圆满”的盲目崇拜情结，久经酝酿，既然已在人们心中逐渐扎下了根，一般人只能对其津津乐道，而很难觉察其中还有什么“劣”可言，更难想到这精神的“甜酒”中会有“毒”。一般的人大都只是因为从中获得了心理与精神的满足，便觉得欣慰。到元明时代，中国的小说和戏曲都已称得上有模有样了，可评家中竟几乎无人指责，神往于“大团圆”结局，本属一种病态的欣赏心理。直到了清初的李渔，才觉出剧情应该力求合理，曾论及戏曲“会合”和“收煞”，敢于提出“须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车庖。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夫勉强生情，拉成一处，令观者识其有心如此，与恕其无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绝技，因有包括之痕也。”^①

① 李渔：《闲情偶寄》。

虽然其初衷，也不过是为使戏文可信而已。又过二百多年，王国维得益于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终于对比而看出了这种崇拜“圆满”的情结，象征着国民的心理特点，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① 不过，那时他对中国人这一心态特点，并未持完全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真正对“大团圆”心理反感并放手批判，众所周知是在“五四”前后的事。像鲁迅、胡适诸人，虽然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说起“大团圆”，却都是持否定的姿态。他们已比王国维时代更深刻地认识到东西方人之间的精神差异，大都将中国人的这一思维特征，视为缺乏科学性、不敢面对真实等等脆弱心理的根源来看待，担心它会使中国人永远沉缅在虚幻的美满憧憬里，于是，对它的讨伐自然也就不遗余力。其中，鲁迅对“十景病”、“才子佳人”情节之类的嘲讽，无疑最引人注目。这些笔墨，如同他描写的“阿Q精神法”一样，使人们振聋发聩。这在当时“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气氛里，仿佛是又出现了个当今“温雪子”。其要旨仍是认为，光讲外在的道德解放还救不了中国，必须从根本上疗治国民心理的弱点。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一话题因为当时积重难返的国态事势，曾显得空前激昂慷慨，这当然可以理解。不过，时过境迁后回头看去，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对这种病态心理的揭示和否定，还是即兴批判为多，理性分析较少，情绪激昂却说理不足。这也难怪，心理病态的根治，毕竟得依据心理科学的透彻和可靠。精神弱点的形成，一是本有其根源，再一则是“冰冻三尺

①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非一日之寒”。在这两方面，非靠有情有理的剖析，便无法鞭辟入里。譬如，像后人进一步指明的，企求“圆满”乃出于人的欲望，“有欲无欲像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分界，换句话说，欲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决定性质。生而有，是先天的，不管我们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反正在己身能感知能选择之前早已受之自然，所以这里没有要不要的问题，只是如何对待的问题。”^①说到“如何对待的问题”，所谓“圆满”崇拜心理，其实并不仅仅是个“大团圆”故事结尾的问题，它和中国一般民众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一口吃成胖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还有什么“盖棺定论”之类信条，都不无学理上的联系。这些理，至少是由审美上的“圆满”情趣、社会生活中的“盖棺”期待以及哲学观念的目的意识等层次构成的中华民族综合性“乐感”心理特征表现。“五四”人未能将它们一一分别解说清楚，乃时代使然，同时这也把这话题中最深最难的“内核”，抛掷给了我们这些后来人。

后来的中国人，确实也并没忘记常提这个话题，不过总让人觉得，大家在渐渐淡忘“五四”时代谈论这个话题时的那样一种尖锐的锋芒。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比如，究竟“圆满”崇拜心理是优，还属劣？这质疑竟好像慢慢变得有点模棱两可起来了，甚至还有鼓吹“大团圆”而乐此不疲的。如作家赵树理在一篇写于六十年代的文章里就讲：“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

① 张中行：《顺生论》，第1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圆。”^①按说，写出过那么多受中国农民、平民喜爱的作品的作家，对中国的传统“团圆”和习惯情有独钟，是不难理解的。但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赵树理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那结局与他设想的“团圆”实在是相差太远了。。不知这位作家是否认真思索过，自己最终并未得到“团圆”的原因？其实，致他于死地的“十年动乱”，便有个潜在的政治观念，即“只要目的正确，不必过问手段如何”。那意思也是和热衷于结果、不问过程的“圆满”崇拜心理一脉相承的。能不能说赵树理的死，正象征着他一度憧憬的“团圆”理念的毁灭呢？这是很发人深思的。

近年来，论述“大团圆”的文章更见增加了，还有了专论这个话题的著作。但突出的是，肯定“大团圆”情节模式的看法也越来越多。有的把“大团圆”标示为“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避讳其负面价值；有人则认为“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烦恼甚至是悲剧生活的一种审美心理补偿，无可非议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见解大都是议论文学作品的“大团圆”模式，少有连带分析与这种心理倾向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圆满”崇拜观念的。可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观点便难免片面，难以服人。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仿佛与近来强调中国传统价值的文化大气氛不无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草上风必偃”。世风倾向于重新肯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人们就多谈“守成”，说“建设”，强调“补台”意识，就像极力呼唤华夏那古老的“女娲精神”。但问题是，“补天”行为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不过征诸以往的历史，我总怀疑，光珍视那些道德“五色石”，而缺少心理素质方面的“粘合剂”，那华夏头顶上的那片“蓝天”就

① 《赵树理文集》，第 源卷，第 员源页，工人出版社，员源

真能自然而然补得完全么？这种质疑，大约是现代人不同于“女娲”的思维方式之一。有过“五四”那一段难忘的“民族记忆”，中国人早不该再一厢情愿地偏爱所有的“国粹”，以为全部都是好的东西。如此讲民族传统，套用一句俗话说，有点像是“坎坎坷坷几千年，一下子回到孔孟前”。果真中国的民族前途之忧能如此简单和明了加以澄清，那百年来人们的种种强国之争，岂不是都白费口舌了？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殚精竭虑，思考如何校正人类以往幼稚的思维和心态，以求自身的生存。而破除“大团圆”情结，则称得上医治中国人独特“心病”的一付“苦口良药”。也许，拨正一个已习惯了几千年的心理习惯和情趣，确会让有些同胞感到扫兴。不过，在人类历史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再不做这件可能使人扫兴但能使国民心理清醒健康的事情，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健全，还有什么希望呢？

相比于那些“圆满”崇拜派，现在也并非没有否定“大团圆”模式的见解。例如，近来就看到一位日本女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人的心理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怀着对幸福的渴望，不愿直视现实中存在的悲剧，于是便轻率地给所有虚构的故事都安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样的民族是极少见的。”^①读到多年难见的这种看法，很使人想起当年鲁迅为那本美国人描画中国心灵的书所写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

① 中野美代子：《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样式》，第18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3

国人。”^①其实，鲁迅这是几乎又重复地说了一遍自己早年那些批评中国人惯于讳疾忌医的名言，不过只是将想讳的“痼疾”，已改称为“浮肿”了。试想，一位中国作家为了疗治民族不觉自身患有的心理病态，竟一生从头提醒到死，这显然是因为，鲁迅在有生之年，仍觉得中国心理的这一弱点未根除。至于鲁迅后面的比喻竟比前次温和，究竟暗示着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退化呢，还是他发觉中国人已有了长进，不必再如从前那样言重了哪？其原因我一直没有想太明白。然而，无论怎么说，东方和西方人，近一世纪来始终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人的“大团圆”之类心理，是在世界上“极少见”的，这无论如何是不能等闲视之的。看似。也决非只是个“审美习惯”。若如此，也许才可以真正领悟，鲁迅为何至死都对此耿耿于怀，那样地忧心忡忡了。

趁着中国人还未随地球迈进 2000 年，来梳理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先觉者们关于“大团圆”心理的种种剖析，力求全面挖掘“圆满”崇拜精神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内在伤害，唤醒国民对这一心理包袱的警觉与疗治，使中国人放下背了几千年来的文化负担，轻装上阵，这实际等于家丑外扬，甚至如同自诛民心。我知道，这肯定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其反映实难预料，也许其结果，竟是作者自身的难得“团圆”罢。要果是如此，与已经陈腐的“圆满”崇拜心理诀别，惟一可享受的，大约只有在梳理和批判之中的快乐了。不过这种快乐，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它使人想起哲人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

摇摇幸福不在于其结果，而在于追求的过程。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